

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背后的哲学思考

——读《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有感

■ 游敏

事物总是由深层原因决定表层结果的。如果我们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来分析事物发展的深层原因则更有利于正本清源,把握住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众所周知,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的本质都是金融危机,都是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严重失衡,而失衡的本质就是失去经济系统均衡点的“中心”;当我们摆放东西找不到“重(中)心”的时候就会失稳,这是常识。可是当我们知道西方学术普遍赖以支撑的深层思维方式——形式逻辑中有个“排中律”时候,就同样应该认真地反思。既然深层的思维方式就要求“排中”,那么现实的理论构建和问题处理又怎能找到“中心”而取得平衡呢?“哲学就是认识论”(毛泽东),因此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法则和我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精髓,从深层次分析两次经济大危机背后的认识论根源,寻找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复杂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方法,对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怎么看待 1929 年和 2008 年这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呢?其形成的过程和产生的后果又有何经验可鉴、规律可循呢? 去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那么如何通过这些资料和现实的现象、结果来分析、推理、判断危机的本质呢?该书开

宗明义地提出了分析的逻辑是历史的周期律:“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的方式,也有非线性的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比较》第 4 页)。显然编者这里提出的“线性的方式、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是指形式逻辑可推理的内容,至于“非线性或者逻辑不清、甚至无法解释的现象”背后是否还有逻辑支配? 有的话其逻辑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笔者试图结合此书,通过分析为什么会出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化?为什么全球经济大危机必然是金融危机呢?为什么会出现危机和我们的应对之策是什么等问题给予进一步分析和回答的内容。

一、分工与合作这对矛盾运动是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和诱发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根源

全球经济一体化顾名思义其哲学含义就是指原来局部各经济体之间从无联系、弱联系到强联系直至构成为一个整体系统并在系统内部形成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会有曲折,但其浩荡之势不可阻挡实乃一体化内在的矛盾运动使然。(首句黑体)我们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即是经济领域的“分工与合作”这对矛盾运动所致。因为分工越细、规模越小,导致了与规模经济发生了直接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则必然要求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如开展国际

怎么看待 1929 年和 2008 年这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呢? 其形成的过程和产生的后果又有何经验可鉴、规律可循呢? 去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以下简称《比较》)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资料。

贸易等才能兼分工与规模的两者之利,因此正是这种矛盾运动不断地推进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比较》一书指出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都发生在技术革命之后,从实质上讲即是以电力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导致了社会组织的“分工与合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方面“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小到个人、企业,大到国家、地区都越来越被局部化,都转化为全球社会生活链、生产链、信息链中的一个节点;另一方面,其对立面的反运动——“合作”的形式也从最初的实物共享、货币等价交换到借助交通、信息技术的支持和价值规则的碰撞而发展到全球各经济体互动明显加剧的互联网金融新阶段。显然其间“合作”的形式和区域幅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我们把全球经济系统作为一个系统

整体来审视,其最基本的单元则为“供—中介—需”,而这其中的“中介”即为联系供需两端的中间物——“信息流、交通物流、货币资本流、价值观念流”等等,就成了沟通供需的纽带和实现两者转化的关键。因此它们就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获得了“时空位置”上“居中”特殊功能和现实意义。我国传统文化中把最高权力机关叫“中央”,实际上就是突出了“中”的特殊功能和含义。我们在方法论上常讲“抓中间、带两头”,这里居中的交通要塞历来成为大国霸权的战略要地自不必说,而信息不对称、货币非中性、人的预期与价值观念的中间属性则更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因而也就成为经济系统中的最重要环节,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和深入分析。

分工必然需要合作,分工越细,合作规模和跨度就越大,合作者之间的中间联系环节对经济系统的稳定平衡作用就越突出。我们注意到现代社会与“分工”相伴随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带有微观“局部化”的本质特征,而其逆向运动的“合作”则需要通过彼此间的联系来实现,因而就具有“整体性”的本质特征。经济系统内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之间由于中间环节发生了联系不畅(价格、工资粘性)、交通物流阻塞、信息失真或不对称、货币非中性或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实是分工与合作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也是出现危机的关键环节。所谓“抓中间带两头”,这是由事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的。也即“交通、

信息、货币金融、价值观念、规则、政府产业政策与监管”之“中间属性”对经济系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由于它们“居中”的重要“时空”位置决定的。当然两端供需自身的结构也会出现“问题,不过只要中间的传导机制灵活、健全、公平则都可以随时空转化而逐渐达到一般的均衡,而唯独中间出现问题则最容易造成整体系统的扭曲或者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的原因。可见“中”的位置之特殊,能量之巨大,对维持与其左右两边共同构成之系统的稳定是最为重要的。

马克思当年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垄断了信用,因此就垄断了世界的交往方式和经济的交换方式,垄断了大宗商品交换的定价权,使金融资本具有买空卖空的特权。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中介人社会,这个中间人领域的日益庞大、不事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征,也构成了对社会的威胁。由此可见金融资本之垄断和“居交往方式和交换方式”“之中”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意义的。《比较》一书指出两次大危机虽然有人口结构、技术条件、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全球化程度、世界经济格局等不同,但危机都源于货币、金融政策却是相同的。这正深刻地说明了货币金融作为媒介是因为其“居经济系统之中间位置”,所以必是分析经济大危机根源的最重要抓手。

(下转 02 版)

打造 2.0 版的大集团战略发展模式

——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2014 年年会上的演讲

■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前副理事长 管益忻

1、在公司经营成败定位上,从“成功企业”向“时代企业”转变

张瑞敏说什么是成功企业?成功的企业就是踏准了时代节拍的企业。但你不可能永远踏准节拍。所以,只有时代企业,没有成功企业。而要想踏准时代节拍,就必须抓好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

成功企业之成功,是因为它踏准了时代节拍。但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永远踏准时代的节拍,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企业就像冲浪者,今天冲上了这个浪尖,并不能保证明天还在浪尖上。举一个例子说,手机行业,摩托罗拉曾是手机业的老大,但它很快被诺基亚超越,原因就在于时代变化——摩托罗拉是模拟时代的霸主,而诺基亚是抓住了数码时代的机遇。但是,诺基亚很快又被苹果所超越,因为苹果抓住了互联网时代的机遇,所以说,如果你跟不上时代,就会被淘汰,这是非常快的。

杨元庆说:“PC 企业,如果没有准备好,就进入了后 PC 时代;如果准备好了,则进入的是 PC+时代。”这几句话,或可称为经典语言,它正在成为以其具体实践背书者类似张瑞敏所提出之“时代企业”论说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1)从“相对路径依赖”到“绝对路径依赖”。

前些日子去窑矿集团讲学,提到联想我说,从我们行业来说,如仅仅是煤化工一般性东西,即使是早已有了“放顶煤”技术也就只能说是进入“PC 领域”,而“PC 时代”则要求在原有的放顶煤这样的技术之上,在基煤产业之上再有更前卫的创新才算数。由此可见,这就有一个“相对路径依赖”和“绝对路径依赖”分野的问题。

所谓“相对路径依赖”是指,你是进入了后 PC 时段,但并没有踏准时代的节拍,只是沿着表层产业发展轨迹运行;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而所谓“绝对路径依赖”,则根本不同了,这是指企业真正沿着消费者生活方式演变轨迹——向更前卫领域运行发展了——即企业 PC+时代了,踏准了,踏进了时代节拍了。

大家都已看到当今世界,全球 IT 市场正处于一个巨变和多变的时期,移动互联网时代强势来袭,既往的行业规则和格局被统统打乱,消费者已进入“后 PC 时代”,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成了数据和网络的入口,它们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传统厂商的市场被严重压缩。而另一方面则在移动互联网模式与云计算、大数据浪潮的冲刷下,每个产业链上的节点都在重新排列,那些在 IT 这场大风暴中无法独善其身的强者们,唯有忍痛转型,以求生存。这就要求企业必须从(沿着市场表层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相对路径依赖”向

战略转型第一位的要素是决定一切方面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思维模式转型。在这一总的大前提下应着重抓好如下若干个转变。



(沿着消费者生活方式演变轨迹)的“绝对路径依赖”转变。

(2)从“同代行业排序替代”向“跨代行业排序替代”转变。

手机行业诺基亚替代摩托罗拉,苹果超越诺基亚等,莫不如此。既往的竞争是相当长一时期 1、2、3 名排序不变,一名老大“守”,二名“随”,三名是追赶者。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发展动辄是上一段是老大下一段就被淘汰了,没有什么“PC 王”之说。上文所说窑矿现在是以其预先发现上马的“煤制油”(现在可称“王”)而踏准节拍的。而联想集团在夺取“PC 之王”宝座后,一刻亦未敢松懈,一直在探索新领域并不断向上攀爬,大搞空前的突破。有人说,这真似公元前 49 年,凯撒打破禁忌带兵越过卢比孔河,击垮庞培一样。他们的做法对于许多大企业集团战略发展都有着某种样本意义。

杨元庆在内部会议上一再强调,如“不彻底转型,要么像诺基亚惨败;要么如(我国)台湾同行如宏碁、华硕等——虽然不断推出新品但囿于传统范围内,而最终同样失败。”而联想却早已不甘心扮演时常被上游掣肘的 PC 厂商,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它们迅速找出了一条新的道路——移动互联网。

(3)从“(王”位)“被颠覆”向“自颠覆”转变。

超越“王”而迈出新步伐,联想逐渐找到了一些新感觉,慢慢改变自己在产业链上的定位。这种感觉就是在传统产业的禁锢下难以以出

现的创新能力。它们不甘心只做制造商——“我们要做世界一流的创新企业”。这意味着,联想深深懂得一切都要发生巨大的改变。PC 市场的第一名,已经不能让联想持续兴奋。当然,这应当适应战略发展递进企业内部架构再造。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的统一必须以组织的物质的统一来巩固。

毫无疑问,旧的内部架构已不能适应产品线的新变化,它们成立了新的业务集团——“MIDH”(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家庭业务集团的简称),在这个新的 BG 里,各种移动互联网终端,研发、供应链、销售、售后全部被整合,以提高效率和执行力。在这同时作出主导架构重大调整:

(3.1)成立新的业务集团。2011 年初成立了新的业务集团——MIDH(移动互联网和家庭业务集团)

(3.2)打造新的产业链即互联网产业链。在这个新的 BG 里,发向各种互联网终端,研发、供应链、销售、售后全部被整合,以提高效率和执行力。

(3.3)推出新的四面包剿的产品群,使产品“三英战吕布”。当年 11 月,联想接连推出了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多款新品,要“三英战吕布”地与苹果竞争。

(3.4)产业资本主导同金融资本主导人分开。柳传志把董事长交给杨元庆。也就是在这一月,柳传志从联想集团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将权杖交给了杨元庆。

(3.5)给新业务找准方向。自从 2011 年初联想调整了内部管理架构之后,给新业务找准了方向。时至今日,联想已多次调整架构,包括今年将 MIDH 更名为移动业务集团,新成立多个业务集团(除移动业务集团外,还有 PC 业务集团、企业级业务集团、云服务业务集团),不光是旗下产品销量上升所引起的相应调整,联想的品牌定位,也由此变得更加清晰。

2、在企业导向价值定位上,从“单纯经济价值”导向运作向“大视野价值”导向经营运作转变

下面,我们主要以食品安全为例作出阐述。中国台湾“地沟油事件”引人深思。

(1)台湾“地沟油事件”发生的历史标的。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台湾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食品生产大区,是食品品牌富集之岛。而在中国内地消费者眼里那更是“好得很”,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牢靠程度,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和自律意识,都明显优于内地。然而,出人意料,近两年相继爆发的塑化剂风波、毒淀粉事件、劣质油丑闻,以至这次“地沟油事件”,这种全岛“沦陷”的食品安全丑闻,不能不令内

地消费者重新给予认定;作出大纵深的历史性考察和分析。

(2)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由“乱”到“治”历史经验的失效。

这些年来,经过系统性整治,食品安全似乎正在由“乱”到“治”向着历史拐点演进。而现实一再告诫人们,食品安全防控是个世界性具有大时空跨度的难题。君不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和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食品安全问题同样形势严峻。当然,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主要经过完善市场法制,都先后大体步入了较成熟的生产治理阶段。然而,到今天那些“老皇历”不行了。

(3)市场自由派学说经济价值主导的终结。

市场自由派学说将这一历史性现象概括为前后因果相连的“四条”市场理论:其一,假冒伪劣商品猖獗往住是市场不成熟的副产品;其二,市场不成熟首先囿于市场法治的不成熟;其三,市场法治的不成熟又囿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现经常性越位、缺位和错位;其四,“看不见的手”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会迫使市场参与者最大限度地实现诚信自律。

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市场自由学派的解读,也许在对某段时期的解释似可说得通,似乎可以。但是,到今天,根本形势变化了,现实表明,价值观生产、价值追求同产品(服务)相分裂、相脱离的交易机制和商业模式不行了,必须将二者绑定一起上市。就是说,生产者、经营者必须将每件产品,每项服务的上市伴同其内涵价值观一起上市,一起作总体价值观展示。这就是说,价值体系的交易,不再是仅仅由产品、服务自己说话的碎片式价值片断,而是全面、系统的一整个价值观体系的交易、出售。为什么这么说?

理由一:“全球沦陷”表明根本交易机制发生了变化。

现在连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也都出了问题了。用全球化眼光观照,即会发现这一次不仅是中国台湾“全岛沦陷”,而是“全球沦陷”了,表明新一轮那样的“向好”时段过去了,寿终正寝了。

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这些年不仅中国台湾,还包括欧洲、美国、东亚,乃至全球化都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丑闻,以及对传统市场理论构成的冲击,都告诉人们要根治中国内地(以及台湾)接连出现的以“地沟油”丑闻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根本上优化、再造交易机制。

理由二:自律治不了资本的贪婪本性。

不能迷信市场自律,仅仅自律那是治不好的。市场本身治不了资本的贪婪本性,而政府、

社会组织、顾客等综合治理,也只有从价值观入手才能真正牵住“牛鼻子”。这次中国台湾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一方面是政府常态监管力度太弱,甚至有些环节简直形同虚设;而更为严重的是过分相信和依赖企业自律,这其实是很不靠谱的。迷信自律的逻辑与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相悖,更与市场主体必须接受顾客、政府监管的现实逻辑相悖,否则,纳税人就无需花大价钱“聘请”政府代行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理由三:再回到主要靠政府这只手强制管也是行不通的。

越位或超经济强制都不行。问题是“看得见的手”以什么样的目标去管。不要再用政府这种行政方式这种超经济强制办事了。

有人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包括食品安全监管在内的各项市场监管,不同程度有过一段弱化“看得见的手”的问题。其实,最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紧紧抓住以价值观主导优化市场交易机制这条主线。按照现代社会治理的逻辑,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更始终把现有监管平台、监管资源、监管法制、监管队伍使用好,真正的希望在于逐步建立起以正确价值观导向下的包括政府强制监管为主导,社会参与和企业自律充分发力的食品安全长效机制。

理由四:只有对产品、服务实施大视野价值观全链绑定运行才是唯一出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使每个企业的经营从“营销”转向“营销”转变,即企业从经营销售产品换回货币向经营消费者、经营消费者的消费生活转变。这是企业经营观,也是市场交易机制实现根本历史性转型的关键一环。上文说到的与全链绑定一起运行的大视野价值观,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兴盛的价值观念。

我以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兴盛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在其巨著《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提出并一再阐述的一种旨在探讨市场经济新型价值观的原创理念体系。他在阐述大众的兴盛——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新工业,新产业的构思,开发与普及即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之后,强调经营好顾客即用户的生活消费,进而指出这应作为企业、企业家、企业每一员工核心的价值追求。他指出,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获得收入可以带来兴盛,但收入本身不属于生活的兴盛。这种创新活力可能被制度约束和消弱,而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态度和信仰都是现代经济活力的源泉,任何制度、法制和各种商业,金融制度,科技进步等都是第二位的。

(下转 04 版)